

# 艾南英的师古与反骈

于景祥

---

艾南英是晚明文学复古思潮中的重要人物,虽然他在文学主张和文学创作实践上都以复兴古文、反对骈文为主要特征,但是,在具体的方向和道路上却与唐、宋以来的古文前辈有所不同,与同时代的复古派也有明显的差别。他一方面倡导取径唐宋、上溯秦汉的师古道路,即先以韩愈、欧阳修、苏轼、曾巩等唐宋古文家之文为津筏,然后再由此上溯到秦、汉散体古文,反对前后“七子”直接取法秦、汉古文的主张,又对取法六朝骈文的倾向和路径予以否定和批判。另一方面,他还从体制上对骈文和散体古文进行辨析,大力推尊古文,极力批判、否定骈文,在骈文批评方面既有贡献,又带有明显的偏见。

---

在晚明多元化的文学思潮中,艾南英总体上属于复古派阵营。但是同其他复古派文人相比,艾南英的师古方向和路径更为明确,因而他反对骈文也更具自觉意识,虽然其中不免偏颇,但是对骈文的分析和批判则比一般的批评家更有深度。

## 一、取径唐宋与上溯秦汉的师古道路

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,复古反骈的思潮由来已久,但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探索过程。西魏的宇文泰早就致力于复古反骈,命令苏绰法《尚书》体作大诰。到了唐代,这一思潮不断发展。如独孤及已经明确提出“本乎王道,大抵以五经为泉源”<sup>①</sup>的主张,说“俪偶章句,使枝对叶比”的文章骈化倾向“大坏也”<sup>②</sup>。再如柳冕,一面倡导“学而为道,言而为经,行而为教”<sup>③</sup>,强调“意”要“复古”,文要“逮古”<sup>④</sup>,一面抨击骈体,称之为“淫丽形似之文”、“亡国哀思之音也”<sup>⑤</sup>。但是,因其路径脱离现实,片面复古,违背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,忽视了文学本身应有的艺术特性,虽有开风气的作用,却未能“自开生面”<sup>⑥</sup>。中唐时期,韩愈继续倡导师古反骈,但其路径与古文前辈不同。他文道并重,“志在古道”,“又甚好其言辞”;反对模拟,注重创新,讲究“惟陈言之务

去”<sup>⑦</sup>，“惟古于词必已出”<sup>⑧</sup>，强调“师其意不师其辞”，“能自树立”，“不因循者是也”<sup>⑨</sup>。总之就是师古宗经，明圣人之道，兼师其文而又能自树立。宋人的复古反駁道路与韩愈相衔接。如宋初的柳开便是“续韩、孟而助周、孔”<sup>⑩</sup>，因为“慕韩愈、柳宗元为文”，所以自“名肩愈，字绍元”<sup>⑪</sup>。明确地说：“吾之道，孔子、孟轲、扬雄、韩愈之道；吾之文，孔子、孟轲、扬雄、韩愈之文也。”<sup>⑫</sup>不但把“孔子、孟轲、扬雄、韩愈之道”作为道统，而且也把“孔子、孟轲、扬雄、韩愈之文”作为文统来看待，只是没有更进一步的理论阐述。此后的欧阳修，也以继承韩愈复古反駁的道路为己任，在《记旧本韩文后》一文中就说自己与朋友“相与作为古文”，使“天下学者亦渐趋于古”<sup>⑬</sup>。苏轼在《六一居士集序》中有云：“愈之后三百有余年，而后得欧阳子，其学推韩愈、孟子以达于孔氏，著礼乐仁义之实，以合于大道。”<sup>⑭</sup>点出由欧阳修上溯韩愈、孟子以达于孔子的方向和道路，但缺乏理论阐述。南宋时期，有人间接谈到师古学文的路径问题，如朱熹就主张学文应该合苏轼、苏洵、欧阳修、曾巩、韩愈、柳宗元“数家之文”<sup>⑮</sup>之长，不过，这与古文家的路径衔接不上，也缺乏理论阐释。

明代师古反駁的文学流派众多，但是方向和道路不同。如“前七子”、“后七子”，把方向和道路定在秦汉，其中“前七子”尤为突出。据《明史》，李梦阳就曾片面强调“文必秦汉”，忽略了唐、宋的古文传统。相比之下，“唐宋派”的视野相对宏阔，不但关注到唐、宋两代，而且又上溯到秦、汉，勾画出了源远流长的古文统系。如茅坤在《文旨赠许海岳沈虹台二内翰先生》一文中指出：“孔、孟没而《诗》、《书》六艺之学不得其传，秦皇帝又从而燔之……西京之文号为尔雅，其最著者，贾谊、晁错、董仲舒、司马迁、刘向、扬雄、班固是也。魏、晋、宋、齐、梁、陈、隋之间，斯道几绝。唐韩愈氏出，始得上接孟轲，下按扬雄而折衷之。五代之间，浸微浸灭。欧阳修、曾巩及苏氏父子兄弟出，而天下之文复趋于古。”<sup>⑯</sup>这是按时间顺序，对秦、汉到唐、宋这一文学发展演变线路的描述，其中包含着古文的文统，这就是由孔、孟到扬雄等人，再到韩愈、欧阳修、曾巩及苏氏父子兄弟的文章统系。在《唐宋八大家文钞总序》中，茅坤也有类似的描述：“魏、晋、宋、齐、梁、陈、隋、唐之间，文日以靡，气日以弱，强弩之末且不及鲁缟矣，而况于穿札乎？昌黎韩愈首出而振之，柳柳州又从而和之。于是，始知非六经不以读，非先秦两汉之书不以观。”<sup>⑰</sup>应该说，对韩愈师古反駁的方式和过程的描述是比较清楚的，但是对于具体的方向和道路问题的阐述，显然还不够具体，也不够明确，还没有达到方法论的层面。

相比之下，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，就师古反駁的方向和道路的理论阐述而言，明末的艾南英则明晰得多，其《答陈人中论文书》一文中指出：“足下谓宋之大家，未能超津筏而上。又谓欧、曾、苏、王之上，有左氏、司马氏，不当舍本而求末。夫足下不为左氏、司马氏则已，若求真为左氏、司马氏，则舍欧、曾诸大家，何所由乎？夫秦、汉去今远矣，其名物、器数、职官、地里、方言、里俗，皆与今殊，存其文以见于吾文，独能存其神气尔。役秦、汉之神气而御之者，舍韩、欧奚由？譬之于山，秦、汉则蓬山绝岛也，去今既远，犹之有大海隔之也，则必借舟楫焉，而后能至。夫韩、欧者，吾人之文所由以至于秦、汉之舟楫也。由韩、欧而能至于秦、汉者，无他，韩、欧得其神气而御之耳。若仅取其名物、器数、职官、地里、方言、里俗，而沾沾然遂以为秦、汉，则足下之所极赏于元美、于鳞者尔。不佞方由韩、欧以师秦、汉，足下乃谓不当舍秦、汉而求韩、欧；不佞方以得秦、汉之神气者尊韩、欧，而足下乃以窃秦、汉之句字者尊王、李，不亦左乎？”<sup>⑱</sup>他非常清楚、非常具体地勾画出师古的方向与道路，这就是：以韩愈、欧阳修为凭借（舟楫），由此而至于秦、汉。为什么要这样呢？他说明了原因，因为秦、汉距今太远，犹如隔着大海一样，不能直接到达，必须有所依凭，这个依凭就是韩、欧，取径韩愈、欧阳修就可以上溯秦汉，因为二人得秦、汉之“神气而御之”，所以由此出发为不二法门。当时，基于这条复古反駁的路线，艾南英一

方面对“前七子”和“后七子”的复古主张和道路进行批判,指出:“洪、永而后……一时文章之权,无所主持。于是弘治之世(“前七子”)邪说始兴,至劝天下士无读唐以后书。又曰:非三代两汉之书不读。骄心盛气,不复考韩、欧大家立言之旨。又以所持既狭,中无实学,相率取马迁、班固之言,摘其句字,分门纂类,因仍附和。太仓(王世贞)、历下(李攀龙)两生,持北地之说,而又过之,持之愈坚,流弊愈广,后生相习为腐剿,至于今而未已。”<sup>⑩</sup>另一方面,艾南英对当时推崇六朝、复兴骈文的思潮,更是大力抨击。这样,在反对“前七子”和“后七子”的复古路线的同时,反对、抨击骈文就成了艾南英文学批评的重要内容。

## 二、对取法六朝骈文的倾向和路径予以否定和批判

因为艾南英标举取径唐宋、直溯秦汉的师古道路,所以对其他与此相背的学文途径自然有所批判,其中对取径六朝的作法尤为不满,极力抨击。这一点,在他与陈子龙、夏允彝的论争中,表现得尤为突出。陈子龙是几社的创始人之一,他在文学上有一个突出的特点:一方面在理论上提出“文当规摹两汉”<sup>⑪</sup>,否定唐、宋文章,继承前后“七子”的复古论调;另一方面又推崇六朝,重视词采。在创作实践上,他是骈文与散文兼作,特别在骈文方面,堪称大手笔。艾南英与陈子龙之争的确有其内在的因素,根据陈子龙自撰《年谱》记载,崇祯元年(1628)秋,艾南英与陈子龙相会于娄江之弇园。论文之时,艾南英当众极力抨击“前七子”代表李梦阳和“后七子”代表李攀龙,“众皆唯唯”,不与争辩,而陈子龙年少,又“在末座”,却“摄衣与争,折其角”。夏允彝等人又从旁助阵,支持陈子龙。当时艾南英态度不好,语言“粗鄙”,“使人不堪”,陈子龙也一时火起,竟然动武,“手批其面”。事情过后,论争没有结束,艾南英与陈子龙及夏允彝等人“犹作书往返,辩难不休”<sup>⑫</sup>。考察整个过程,其争论的焦点就在于师古的道路问题上。陈子龙虽然与前、后“七子”有相同的一面,标举秦、汉,但是在理论和实践上如前所述,都有取法六朝的倾向,而艾南英则力主取径唐、宋,直溯秦、汉,坚决摒弃六朝骈文,两者泾渭分明。

艾南英在《答陈人中论文书》中指出:“足下以赋病宋人,诚是矣。然天下安有兼材,必欲论赋,则奚独宋人?自屈平而后,汉赋已不如矣,楚以下皆可病也。然则足下《悄心赋》,何不直登屈氏之堂,而乃甘退处于六朝,排对填事、柔靡粉泽如是,而讥宋赋,恐宋人不受也。宋之记诚有如赋如文者,然亦其一二尔。以此而病全宋,是犹见燕、赵之丑妇,而遂谓北方无美女;见吴之粗缯败絮,而遂谓江南无美锦等尔。如是而以变乱古法罪宋人,宋人不受也。”<sup>⑬</sup>这是以宋文为切入点而展开的有关师古路径的论争,陈子龙对宋文特别是宋赋有所诟病,又批评宋之记有如赋、如文的问题,文体不纯,所以他作赋便师法六朝。艾南英则对他这样的师古路径提出批评:一方面指出陈子龙因为宋赋存在弊端“而病全宋”的做法有失片面;另一方面则着重从师古路径问题着眼,批评陈子龙的路子不对,认为屈原以后之赋已成衰势,即使汉赋与屈赋相比都已经不如,所以如果要师法,也应该取径屈原,决不该取径六朝,进入骈化轨道,讲究对偶、用典、藻饰,追求词采、色泽,呈现出华丽柔靡之态。接下来,他又结合自己的创作实际,批判六朝骈文,指正陈子龙的错误:“及足下行后,则从友人得见足下所为《悄心赋》,乃始笑足下向往如是耶!此文乃昭明选体中之至卑至腐,欧、曾大家所视为臭恶而力排之者。不佞十五六岁时,颇读《昭明文选》,能效其句字。二十岁后,每读少作,便觉羞愧汗颜。而足下乃斤斤师法之,此犹蛆之含粪以为香美尔。故张口骂欧、曾,骂宋景濂,骂震川、荆川。足下所宝持如是,不足怪也。”<sup>⑭</sup>这里,艾南英首先嘲笑陈子龙向往六朝骈文的行为,同时又对这种骈俪之体大加抨击,全盘否定,认为是“至卑至腐”之文,并且抬出欧阳修来为自己的论点张本。他又现身说法,

对自己早年攻读《昭明文选》取法六朝骈文的错误做法感到“羞愧汗颜”,觉得自己当时是不分好坏、香臭,如同“蛆之含粪以为香美”,对六朝骈文的厌恶之情,溢于言表,由此也进一步显示出取径六朝骈文之荒谬。在与其他人的书信中,艾南英有时也不忘批评陈子龙的师古路径。如在《再答夏彝仲论文书》一文中,他还捎上一笔:“人中(陈子龙)乃欲尊奉一部《昭明文选》,一部凤洲、沧溟集,弟所视为臭腐不屑者,而持此与弟争短长。”<sup>②4</sup>继续对陈氏取径六朝骈文的作法进行批评。除与陈子龙论争之外,艾南英在与其他人论文之时,也经常强调自己取径唐、宋,直溯秦、汉的师古路径,批判取法六朝骈文的倾向。例如他在《与周介生论文书》中就指出:“夫文之通经学古者,必以秦、汉之气,行《六经》、《语》、《孟》之理,即间降而出入于韩、欧、苏、曾,非出入数子也,曰:是数子者,固秦、汉之嫡子嫡孙也。今也不然,为辞章者,不知古文为何物,而猎弇州、于鳞之古以为足,不知此非古也,六朝之浮艳而割裂补缀,饰之以《史》、《汉》之皮毛者也。为制艺者,不知古文为何物,而袭大士大力轻俊诡异之语以为足,不知此非古也。晋、魏之幽渺纤巧,当世以为清潭为玄慧者也。最陋则造为一种似子非子,似晋、魏非晋、魏,凿空杜撰之言,沾沾然以为真大士大力矣。弟旧岁于陈兴公稿序稍一言之,而同气者颇相怪责,不知弟于此道,浅深甘苦备尝之矣。”<sup>②5</sup>十分清楚,他首先标举的还是他的师古路径和主张:通经学古必须出入于韩、欧、苏、曾,即取径唐、宋,然后再上溯秦汉。为什么呢?因为韩、欧、苏、曾数子是“秦、汉之嫡子嫡孙”,是无可怀疑的正宗。然后,他便把批判的矛头对准当时与此相背的文学倾向:如有些写八股时文者,根本不知道古文为何物,抄袭一些轻俊诡异之语,自以为师古。不过这里批判的重点是那些盲目师法“后七子”王世贞、李攀龙假古文的不良倾向,深刻揭露这类人文章的真面目:割裂补缀柔靡浮艳的六朝骈文,又“饰之以《史》、《汉》之皮毛”,由此便生出一种非驴非马之文——似子非子,似晋、魏非晋、魏,凿空杜撰的文章,并且以“最陋”二字概之,应该说批判的语言是比较严厉的。可见,在艾南英的骈文批评中,批判取法六朝骈文的倾向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方面。

### 三、从文体上辨析骈散优劣

艾南英的骈文批评,并没有停留在与其他门派的路径之争上,他还从微观入手,着重从文体上对骈、散二体进行具体、深入的剖析,进而比较其优劣。

(一)从文体上揭示骈文讲究对偶、句式整齐之弊。如其《答陈人中论文书》:“足下又引李于鳞之言曰:‘宋人惮于修词,理胜相掩。’以为宋文好易之证。然予则曰孔子云:‘辞达而已矣。’未闻辞之碍气也。辞之碍气,为东汉以后,骈俪整齐之句言耳。”<sup>②6</sup>文中以《论语·卫灵公》中“辞达”说为理论依据,从文气上进行分析,明确指出骈文有“碍气”之弊,即语言滞涩诘钉,气势不够舒畅。并且从其文体上找出原因:骈体文句式过于整齐,缺少变化。其实,对骈文的这一弊病,早就有人指出过,如刘勰在其《文心雕龙·丽辞》中就曾批评此类只讲对偶,一味追求句式整齐的骈文,并且提出解决这种问题的办法,即骈散结合,调节语言句式,使之灵活多变。艾南英抓住骈体文的这一短处,应该说是比较有眼光的。但是,他的说法也有一定的片面性:把东汉以后的骈体都归于“碍气”的范围,打击面过大。其实,不是所有的骈文都气势不畅,有相当多的作家所作的骈文不但形式精美,而且没有“碍气”之病,如刘勰《文心雕龙》中的诸多篇章,庾信后期的文章,王勃的《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》,骆宾王的《为徐敬业以武后临朝移诸郡县檄》等,都是句式比较整齐,气势比较通畅的骈体佳作,没有“碍气”的弊病。所以,艾南英的说法也有可商榷之处。

(二)从文体上对骈散二体进行比较、剖析,为古文正名。如其《答夏彝仲论文书》:“兄知古文之所以名乎?今之时以碑、铭、序、记、传为古文,对八股时艺而言耳。古人未有八股时文,所称古文者安在?如以碑、铭、序、记为古,则韩、欧有之,王、杨、卢、骆辈皆有之。欧阳公得旧本韩文,乃始知为古文。其序苏子美曰:‘子美之齿少于予,而予学古文乃在其后。’盖昔人以东汉末至唐初偶俳摘裂、填事粉泽、鲜丽整齐之文为时文,而反是者为古文。譬之古物器,其艳质必不如今,此古文之所为名也。若以辞华为古,则韩之先为六朝,欧公之先有五代,皆称古文矣。”<sup>②</sup>这里,重点是为古文正名,但是其方式是从文体辨析入手,首先指出当时对古文的错误认识:以不同于八股时文的碑、铭、序、记、传为古文,却不知在八股没有产生之前,古文家、骈文家都有这类文章,它们不专属古文范畴。那么,什么是古文呢?简而言之就是:东汉以来讲究对偶、用典、藻饰,句式整齐,词采浓丽,色泽鲜艳者为骈文;反之,不讲对偶、不重用典、不重藻饰,奇句单行、风格朴实者为古文。这样的辨析确实很清楚。在此之前,唐韩愈曾倡导古文,并从文体的角度提出古文的观念:“愈之为古文,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耶?思古人而不得见,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。”<sup>③</sup>韩愈的所谓“古文”就是指这种不讲对偶、不重用典、不重藻饰、奇句单行的文章,但是,遗憾的是没有作具体的文体辨析。李商隐也曾谈到古文和骈文:“樊南生十六能著《才论》、《圣论》,以古文出诸公间。后联为郢相国华太守所怜,居门下,时敕定奏记,始通今体。后又两为秘省房中官,恣展古集,往往咽嗟于任、范、徐、庾之间。有请作文,或时得好对切事,声势物景,哀上浮壮,能感动人。十年京师寒且饿,人或目曰韩文杜诗……大中元年被奏入岭,当表记,所为亦多。”<sup>④</sup>他以古文与今体(骈体)对举,说明自己在创作上的前后变化,但是也没有从文体上进行比较和辨析。再如宋人欧阳修在其《记旧本韩文后》一文中说:“是时,天下学者,杨、刘之作,号为时文……后七年,举进士及第,官于洛阳,而尹师鲁之徒皆在,遂相与作为古文。”以古文、时文对举,也没有文体辨析。此外如元代陈绎曾在其《四六附说》中谈到骈文创作方法时说:“联串两句,融化明白……则式虽四六,与古文不异。”<sup>⑤</sup>还是没有从文体上明确说明古文的本义。其《古文谱二》中又把古文与时文加以比较,指出:“右,古文一主于实,实题实做,虚题亦实做,叙事则实叙,议论则实议是也;时文一主于虚,虚题虚做,实题亦虚做。只此是古文、时文分别也。”<sup>⑥</sup>这比以前是具体一些,但是仍然没有说清楚骈文与古文的文体问题。吴讷的《文章辨体》中也涉及到骈文与古文的辨析,如其《凡例》中有曰:“四六为古文之变。”不过也很笼统,没有从文章体制上进行深入辨析。从文学批评史上看,像艾南英这样对骈散二体进行上述清楚的辨析,还十分少见。

(三)比较骈散之优劣。如其《与周介生论文书》:“夫文之古者,高也,朴也,疏也,拙也,典也,重也;文之卑而为六朝者,轻也,渺也,诡也,俊也,巧也,俳也,此宜有识者所共知矣。无怪兄之憫然忧之,而有哀集先辈大家之举也。虽然,愿兄细酌之。”<sup>⑦</sup>文中清楚地划分出古文与骈文的高低之别:古文之高就高在高、朴、疏、拙、典、重六个方面,骈文之低就低在轻、渺、诡、俊、巧、俳六个方面。据此,他极力贬斥骈文,“视为臭恶”,否定之词为“至卑至腐”、“犹蛆之含粪”<sup>⑧</sup>,无以复加。在艾南英之前有许多批评家否定、批判骈文,有的言词也比较犀利,如唐人独孤及在《检交尚书吏部员外郎赵郡李公中集序》中曾经这样批判、否定骈文:“及其大坏也,俪偶章句,使枝对叶比,以八病四声为楷拳,拳拳守之,如奉法令,闻皋繇史克之作,则呶然笑之。”<sup>⑨</sup>柳宗元《乞巧文》中也写道:“眩耀为文,琐碎排偶……骈四俪六,锦心绣口,宫沉羽振,笙簧触手,观者舞悦,夸谈雷吼。”<sup>⑩</sup>晚唐黄滔在《与王雄书》中语言更为尖刻:“夫俪偶之辞,文家之戏也,焉可责其戏于作者乎?是若扬优喙,干谏舌,啼妾态,参妇德,得不为罪人乎?”<sup>⑪</sup>再有金人王若虚用语也比较严厉:“四六,文章之病也。而近代以来,制诰表章,率皆用之。君臣上下之

相告语,欲其诚意相孚,而駁语浮辞,不啻如俳优之鄙,无乃失体耶?后有明王贤大臣,一禁绝之,亦千古之快也。”<sup>⑤</sup>但是像艾南英这样用比较过分的语言批判一种文体还是非常罕见的。

如果从客观的角度对艾南英的駁文批评作个评价,大体上应该是这样几点:

(一)艾氏取径唐、宋,直溯秦、汉的复古路径虽然比泥古不化者,或片面猎取秦、汉之文词者有些进步,但是完全否定六朝駁文也有失偏颇。其实,六朝駁文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中是不可或缺的一环,它在文学形式美的创造方面有承上启下的作用,积累了宝贵的财富,因此,不但“初唐四杰”从六朝駁文中汲取营养,杜甫在其《戏为六绝句》中也赞美六朝駁文的代表作家庾信“文章老更成”、“暮年诗赋动江关”。至于一代古文宗师韩愈在“文起八代之衰”<sup>⑥</sup>的同时,也在一定程度上继承八代之美,吸收包括六朝駁文在内的前代文学遗产。所以刘熙载说他是“实集八代之成。盖惟善用古者能变古,以无所不包,故无所不扫也。”<sup>⑦</sup>相比之下,艾南英的复古思想与路线比其祖师韩愈要落后得多。

(二)艾氏从文体的角度对駁散进行辨析,为古文正名,划清两者界限,在文体学上特别有意义,对人们正确认识散文和駁文特别有启发,这是以前的駁文批评家不能比拟的。但是,駁、散二者的划分不能绝对化,成为不可逾越的鸿沟。在文学史上,大多数古文家,特别是艾南英所推崇的“唐宋古文八大家”,都是駁散结合的,在这一点上,艾南英比唐、宋古文大家要保守得多。

(三)艾氏对駁文的批判是比较深刻的,确实切中其要害。但是也有些过激,而且其彻底否定的态度也不够公允。駁文在中国文学史上流行一千多年,出现那么多杰出的作家和脍炙人口的名篇,在中国文学艺术美的创造上有特殊的贡献,一概否定也是不客观的。

①②③④⑤⑦⑧⑨②③④⑤⑥ 董诰等编《全唐文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,第1746页,第1746页,第2372页,第2372页,第2372页,第2475页,第2527页,第2480页,第3606页,第1746页,第2607页,第3843页。

⑥ 赵翼《廿二史劄记》卷二〇,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,第352页。

⑩ 张景《河东先生集序》,曾枣庄等主编《全宋文》卷二七一,上海辞书出版社、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,第352页。

⑪ 永瑢等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五二,中华书局1965年版,第1305页。

⑫ 柳开《应责》,曾枣庄等主编《全宋文》卷一二六,第367页。

⑬ 《欧阳修全集·居士外集》卷二三,中华书局2001年版,第1056页。

⑭⑮ 余冠英等编《唐宋八大家全集》,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,第622页,第418页。

⑯⑰⑱⑲ 王水照编《历代文话》,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,第211页,第1782—1783页,第1268页,第1237页。

⑳ 茅坤《茅鹿门先生集》卷一四,明万历刻本。

㉑㉒㉓㉔㉕㉖㉗㉘ 蔡景康编《明代文论选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,第388页,第397页,第389页,第3387页,第393页,第389页,第393页,第387页。

㉙ 陈子龙《壬申文选凡例》,《陈子龙文集》,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,第667页。

㉚ 陈子龙《陈子龙自撰年谱》,《陈子龙诗集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,第642页。

㉛㉜ 黄宗羲编《明文授读》卷二二,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,齐鲁书社1997年版,集部第400册第30—31页,第27—28页。

㉝ 王若虚《文辨》,胡传志等《〈溇南遗老集〉校注》,辽海出版社2006年版,第426页。

㉞ 苏轼《潮州韩文公庙碑》,《古文观止》,中华书局2005年版,第500页。

㉟ 刘熙载《艺概·文概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,第20页。

(作者单位 辽宁大学古籍所、辽宁大学文学院)

责任编辑 山木